

国族建构中的认同冲突与邻域效应

——以泰国马来族的族群整合困境为例

张 哲¹ 刘语笛²

(1.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 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在泰国的国族建构进程中,大部分少数民族最终都接受了国家的整合政策,或多或少地拥抱了“泰国性”,唯有马来穆斯林却始终未能完全接受对泰民族的认同。通过比较泰国境内其他主要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变迁与融入状况后发现,马来穆斯林的整合困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学界讨论较多的经济不平等与强制同化引发的政治反弹等原因外,泰国官方对“泰国性”的定义引发的身份认同冲突,以及邻国马来西亚带来的消极邻域效应也应被重视。泰国性的定义过于狭窄且带有等级色彩,马来西亚对其跨国同族的政治抗争抱持暧昧和摇摆的态度,这二者极大影响了马来穆斯林的整合困境。

关键词:国族建构;族群整合;泰国性;马来穆斯林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471X(2025) 01-0063-13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25.01.014

在人们印象中文化同质性较强,始终以和平、友善、微笑为标签的泰国,实际却一直面临族群整合的困境。泰国南部与马来西亚接壤的边境三府,其主要人口为马来族,该群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始终未能有效地融入泰民族。根据泰国“深南观察”(Deep South Watch)数据,2004 年至 2024 年间,泰国南部地区共发生暴力事件 22737 起,共伤亡 219065 人,其中死亡 7632 人。^① 这样的族群暴力与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困境缘何而来?

在表面上,泰国常常被看作一个由泰族组成的、信仰佛教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泰国官方和学界至今未能就泰国的族群^②数量达成共识,不同的统计者认为泰国的少数民族数量在 30 个、50 余个或 60 余个不等。^③ 泰国境内的主要族群及人口比例大致如下:泰族(约占 40%)、^④佬族(约占 35%)、华族(约占 10%)、马来族(约占 3.5%)、高棉族(约占 2%),此外还有苗、瑶、桂、汶、克伦、掸等山地族群。^⑤ 泰国玛希隆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学者认为泰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多达 60 余种,除汉藏语系壮傣语支之外,汉藏语系其他语支,以及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苗瑶语系也均有分布;^⑥在宗教上,除主要信仰上座部佛教外,还有部分民众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锡克教以及万物有灵等原始信仰。因此,

收稿日期:2024-09-08

作者简介:张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研究员。

刘语笛,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 ศูนย์เฝ้าระวัง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ภาคใต้(深南观察),<https://deepsouthwatch.org/th>, 2024 年 7 月 16 日。

② 本文使用“族群”对应英文中的“ethnic group”,指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次国家层级的,以语言、宗教、历史传统,或对共同血缘的信念等因素为标准的族类共同体。同时,本文使用“国族”对应英文中的“nation”,专指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国家民族”(state-nation);本文使用的“民族”,除非特别说明,也指与政治统治相联系的“国家民族”共同体,而非“族群”。

③ 参见周建新、王美莲:《泰国的民族划分及其民族政策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19 年第 5 期。

④ 本文所称“泰族”为作为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之一的“泰族群”(ethnic Thai);与之区分,作为民族国家层面的、包含不同族群的泰国国族,本文称之为“泰民族”(national Thai)。

⑤ 数据来源:田禾、周方治:《泰国(列国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4 页;周建新、王美莲:《泰国的民族划分及其民族政策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19 年第 5 期;Minority Rights Group, *Thailand*, <https://minorityrights.org/country/thailand/>。

⑥ สุวิไล เปรมศรีรัตน์, แผนพัฒนา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ต่างๆ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สำนักงา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วัฒนธรรมแห่งชาติ, 2004, p. 18(苏威莱·炳斯叻:《泰国族群语言地图》,曼谷:泰国国家文化委员会和玛希隆大学 2004 年版,第 18 页)。

无论是从族裔性(ethnicity)、语言还是文化角度来看,泰国都并非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国家。

对于多族群国家来说,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族群整合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泰国精英们便开始有意识地制订整合政策,意图让境内各少数民族群都建立对泰国国家和泰民族的认同。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国家不惜采取强制同化政策。经过长时间努力,包括佬族、华族、高棉族在内的大多数少数民族群已经基本完成整合,成为泰民族的一部分,但生活在泰国南部的马来族穆斯林却始终对泰国的国族建构予以抗拒。马来穆斯林^①主要居住的泰南三府于1909年经《英暹条约》被正式划入泰国领土,但他们却从未真正接受泰国的国族建构,其在20世纪初就不断发起争取自治的运动,均遭到泰国政府的驳回与镇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马来穆斯林中开始出现武装叛乱的分离运动,并成立了多个分离主义组织。虽然形势在20世纪80年代后一度趋于缓和,但21世纪以来马来穆斯林的分离主义运动结合着恐怖主义卷土重来,不断对泰国的国家安全和当地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是什么阻碍了马来穆斯林形成对泰国和泰民族的认同?为何马来穆斯林难以接受国家的族群整合努力,直至引发暴力抵抗和分离主义运动?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首先将简要回顾泰国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中佬族和华族等主要少数民族群与国家的互动,并讨论“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强制同化政策引发反弹”等主流解释。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应当从“泰国性”以及“邻域效应”的视角对已有理论予以补充。简而言之,泰国精英定义的泰民族(Thai nation)与泰国性(Thainess)相当狭窄,使得马来穆斯林的认同很难与之兼容,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其接受整合的意愿;同时,邻域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理论强调国族建构中国界以外的影响因素,马来穆斯林与邻国马来西亚之间较为紧密的联系为其提供了对抗泰国国族建构的政治和文化资源。二者叠加,马来穆斯林始终难以拥抱泰国性,其与国家的摩擦也成为泰国国族建构的巨大挑战。

一、泰国国族建构中的少数民族群

如前所述,泰国境内生活着泰族、佬族、华族、马来族、高棉族等诸多族群,也包括苗、瑶、桂、汶、克伦、掸等山地人群。在少数民族群中,人口最多的是佬族和华族。本文将以二者为例,介绍泰国国族建构中少数民族群与国家的互动。

佬族^②主要分布在泰国东北部的呵叻高原地区。在19世纪后期,为了与法国殖民者争夺湄公河左岸的控制权以及推进构建泰国主权国家,泰国官方极力维护泰族和佬族的共同性,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诸如在人口普查中将佬族归入泰族,从而导致对佬族人口的统计极为困难。根据统计来源的不同,大致可认为今佬族人口约在1300~1800万人之间。^③佬族是老挝的主体民族,与泰族存在一定的文化相似性,双方均主要信仰上座部佛教,语言上也同属汉藏语系壮傣语支。17世纪末澜沧王国分崩离析后,大批佬族人越过湄公河逃至今泰东北地区并在此定居。最初,佬族首领保留着相当大的自治权,但随着英法殖民者进入中南半岛,以拉玛五世为首的泰国精英开始以强势控制维护边疆地区主权。泰国政府对东北部地区采取集权式直接控制并建立官僚制度,同时开启一系列强制同化政策。经过宗教改革、建立现代教育系统、建设交通和通讯等措施,泰国政府逐渐将该地区与曼谷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早在1904年的官方人口统计中,佬族人口就已经被涵盖在泰族的类别中,官方对此解释为“佬语和泰语都是同一语族,只有在重音和某些词汇上存在差别……而且,佬族人将自身视作泰族”。^④历经1938年披汶取得政权后的国族主义浪潮,以及在二战后的强制泰语教育影响下,佬族族群认同逐渐弱

^① 本文用“马来穆斯林”指代聚居于泰国南部边境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族。也有部分学者偏好以“南部穆斯林”“泰国马来人”等词汇对其加以称呼,但考虑到许多马来穆斯林不仅强调自己的宗教信仰,还特别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本文选择用“马来穆斯林”一词加以指代。

^② The Lao people,也被译作“老族”“寮族”等,东南亚壮泰语族群,主要生活在泰国、老挝、越南等地。

^③ 周建新、何蕾:《国家整合视角下的泰国伊桑人问题动态发展研究》,《世界民族》2023年第3期;何平:《泰国东北部地区老族的由来及其历史变迁》,《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John Draper & Peerasit Kamnuansilpa, *The Thai Lao Question: the Reappearance of Thailand's Ethnic Lao Community and Related Policy Questions*, Asian Ethnicity, Vol. 19, 2018, No. 1, pp. 4-8。

^④ Volker Grabowsky, *An Early Thai Census: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Bangkok: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1993, pp. 13-14.

化,并逐渐形成了“伊森泰人”或“东北人”(Khon Isan)的地域认同。^①这并非说泰国的佬族完全失去了自己族群认同,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多元文化主义浪潮中,伊森人的音乐、舞蹈、服饰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复兴。然而,在政治动员中,由于伊森地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以及泰国中部主体人群对其歧视性的刻板印象(落后、无知、酗酒等),伊森泰人更多展现出地域和阶级性的政治动员倾向,例如在他信和英拉执政时期的政局动荡中,大量伊森民众成为红衫军的中坚力量。^②

泰国境内的另一重要少数族裔华族^③主要为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移民,明清时期他们大批来到泰国谋生。最初,这些来泰国生活、居留、定居的华人自称“暹华”(Siamese-Chinese)。20世纪中期后,华族与当地泰族通婚的情况日渐普遍,双方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当下泰国的华族人口数量难以精确统计,一般认为在700-1000万人之间,约占泰国总人口的10%~14%之间。^④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族经济已经在泰国大米业、制糖业、橡胶产业等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每年都将大量的资金汇回中国。^⑤1914年拉玛六世在报纸上将华族称为“东方犹太人”,并陆续通过《驱逐出境条例》《强制教育条例》等法规,开始用高压政策将华族建构为泰民族的“他者”。^⑥此后,华族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受限、职业和企业内的族群比例受限,甚至华文教育的空间也被极大压缩。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当中国承诺取消双重国籍后,泰国政府也重新修订了《国籍法》,放宽了入籍限制,大量华侨因此加入了泰国国籍。^⑦此后,越来越多的华族政治认同逐渐转变,从心向中国到“落地生根”,逐渐融入泰国社会。^⑧在1975年中泰建交后,泰国对华族的政策转向宽松,逐步取消了在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的限制,华族不但基本获得了与泰族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与泰族通婚也越来越普遍,族群界限逐渐模糊。

然而,泰国国内的马来穆斯林在族群整合过程中与国家的互动历程却大相径庭。马来穆斯林主要生活在泰国南部边境的北大年府(Pattani)、^⑨也拉府(Yala)、陶公府(Narathiwat)等地,人口约为200万,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本属于北大年苏丹王国,于1832年被泰国征服,并于1909年经《英暹条约》被正式划入泰国领土。马来穆斯林社会中存在一套独具特色且迥异于泰国主流社会的运转体系。以伊斯兰教为核心,他们创建了较为完备的政治结构、法律法规、教育体系、文化习俗和公共生活,并使用马来语方言“亚威语”作为日常沟通语言。^⑩被纳入泰国后,北大年地区的马来穆斯林从未真正接受泰国的统治,但其不断发起的自治运动均很快被镇压。在追求政治自治无果之后,马来穆斯林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以武力方式寻求分离,并成立了多个分离运动组织。这一运动至今仍未停歇,爆炸、

① Charles Keyes, *Hegemony and Resistance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in Volker Grabowsky (ed.), *Reg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 1892-199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5, pp. 154-182.

② Sally Mairs, *Isaan Farmers Rally in Support of Government's Rice Policy*, 8 October 2024, <https://theisaanrecord.co/2014/02/18/khon-kaen-farmers-rally-in-support-of-governments-rice-policy/>. 2024年7月20日。

③ 目前,对于生活在泰国的华裔群体,泰文中常用“具有华人血统的泰国人”(khon thai chea sai jin)这一称呼进行指代,并不区分华族血统的比例多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华族在泰国的融入程度之高。本文选择用“华族”统称加入泰国国籍的第一代华人及其在泰国出生的、具有全部或部分华人血统的后代。

④ Minority Rights Group, *Chinese in Thailand*, <https://minorityrights.org/communities/chinese-6/>. 2024年7月20日; 顾长永、萧文轩:《边缘化或是整合:泰国的少数民族政治》,中国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ศูนย์ข้อมูลกลาง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กระทรวงวัฒนธรรม, ไทยเชื้อสายจีน(泰国文化部文化信息中心:具有华人血统的泰国人), <http://m-culture.in.th/album/193785/ไทยเชื้อสายจีน>. 2024年7月23日。

⑤ 王竹敏:《20世纪前叶泰国华商的投资与银行业》,《丝路的延伸:亚洲海洋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第122-133页。

⑥ Wasana Wongsurawat, *National Emotions and Heroism in King Vajiravudh's Anti-Chinese Propaganda Writing*, *Diogenes*, Vol. 63, 2016, No. 1-2, pp. 48-62; 黄瑞真:《拉玛六世的民族主义与排华思想及其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

⑦ 许梅:《泰国华人政治生活的变迁》,《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2期。

⑧ Curtis Thomson, *Political Identity among Chinese in Thailand*,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83, 1993, No. 4, pp. 397-409.

⑨ 府,泰国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相当于中国的省。

⑩ 龚浩群:《国家与民族整合的困境:20世纪以来泰国南部马来穆斯林社会的裂变》,《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3期; Pierre Le Roux, *To Be or Not to B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Jawi (Thailand)*, *Asian folklore studies*, Vol. 57, 1998, No. 2, pp. 223-255; อัศนี มาหะมะมลายูมุลลิมกับ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ทำให้เป็นไทยวารสารสังคมศาสตร์ Vol. 29, 2560, No. 1, pp. 127-159(阿萨里·玛哈马:《马来穆斯林和泰国化进程》,《社会学刊》2017年第1期,第127-159页)。

枪击、暗杀等行动频繁爆发,对泰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巨大困扰。

2024 年 2 月,在马来西亚的协调下,泰国政府与南部最主要的分离主义组织之一国民革命阵线(Barisan Revolusi Nasional,简称 BRN)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会谈,试图就停火协议达成一项路线图。^① 尽管如此,就过去二十余年的历史而言,现在认为危机已解决还为时尚早,毕竟冲突的根源在于泰国的国族建构努力与马来穆斯林的族群整合危机。

二、马来穆斯林的整合危机:经济、政治、身份认同

在国族建构的理论中,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解释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②的理论类似,“战争说”同样被用于分析国族建构,因为国际战争、反殖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常常有利于形成“聚旗效应”,进而促成民族主义思潮。就这一点而言,泰国在 20 世纪的东南亚属于少见的没有被殖民经历而建国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国族建构的过程中缺少战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淬炼。^③ 此外还有多种影响国族建构的因素,例如国内不同族群的地理分布和聚居程度差别、^④不同族群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⑤特别族群被政治议程歧视和排斥引发的政治怨恨,^⑥等等。

在分析马来穆斯林的整合危机时,既有的主流研究通常有经济、政治、身份认同等理论视角,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族群分层;国家推行强制同化政策引发的政治怨恨和反弹;以及马来穆斯林与泰族在族群和宗教身份认同方面不可调和的冲突等。

首先,许多学者都关注到了马来穆斯林令人担忧的经济状况,提出泰国的族群分层,即经济上的不平等和不平衡是导致马来穆斯林难以转变身份认同的重要原因。^⑦ 毋庸置疑,泰国的社会结构中存在比较明显的族群分层现象。以泰南三府为例,北大年府、陶公府和也拉府的穆斯林人口分别占全府的 87.57%、82%和 81.95%,其城市化率分别为 17.15%、19.75%和 29.62%,^⑧均低于泰国全国城市化率 54%。^⑨ 泰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 年泰南三府的家庭平均月收入分别为 20691、19181 和 17512

① ประชาไท, ไทย - BRN เห็นชอบ 3 หลักร่วมเพื่อสันติสุข มุ่งลดความรุนแรง ปกป้องชาวหรือประชาชน แสวงหาทางออก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 (自由人报:《泰国-BRN 同意三项和平原则:致力减少暴力,征求人民意见,寻求政治出路》) <https://prachatai.com/journal/2024/02/107972>. 2024 年 7 月 24 日。

② 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在现实中与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往往密不可分,毕竟想要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很难脱离民族归属感的培育;然而二者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在本文中,国家建构指建立韦伯式的国家,在固定的领土空间中垄断暴力使用,并掌控政治、经济、社会的主权;而国族建构则指使用教育、语言、意识形态传播等不同的政策手段建构统一的国族/民族认同和归属感。

③ Wang Gungwu, *Political Heritage and Nation Building*,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3, 2000, No. 2, p. 14; 李夏菲,《想象的“他者”与泰国国家主义建构》,《山东社会科学》2019 年第 9 期。

④ Monica Duffy Toft, *The Geography of Ethnic Violence: Identity, Interests, and the Indivisibility of Terri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9-20.

⑤ Lars-Erik Cederman, Nils B. Weidmann &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Ethnonationalist Civil War: A Global Compari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5, 2011, No. 3, pp. 478-495.

⑥ Ludovico Alcora, Haley J. Swedlund & Jeroen Smits, *Discrimin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A Dyadic Analysis of Politically-excluded Groups in Sub-Saharan Afric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46, 2020, No. 2, pp. 251-273.

⑦ Wan Abdul Kadir Che Man, *Muslim Separatism: the Moros in Southern Philippines and the Malays in Southern Thailand*,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7; 陈衍德:《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1-152 页。族群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是社会分层的一个亚型,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米尔顿·戈登(Milton Gordon)等人提出,尤其关注社会资源(经济、教育、权力、声望等)在族群间的不平等分布或分配。在一个多族群社会中,如果一个族群中的大部分人口处于社会中上层,而另一个族群中的大部分人口处于社会中下层,社会阶层与族群身份合二为一,则该社会存在“族群分层”;同时,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将强化族群的内部认同和外部偏见,造成跨族群交往受阻,甚至形成族群隔离,埋下族群冲突的隐患。参见 Robert Park,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4, pp. 506-512; 罗伯特·帕克:《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杭苏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第 15-33 页;米尔顿·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化》,马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年版,第 54-75 页。

⑧ สำนักงานจังหวัดปัตตานี, *แผนพัฒนาจังหวัดปัตตานี พ.ศ. ๒๕๖๑-๒๕๖๕* (北大年政府办公室:《北大年府 2018-2022 年发展计划》), http://www.pattani.go.th/files/com_news_devpro/2021-01_038f5e8b5e4fe11.pdf. 2024 年 8 月 1 日; สำนักงานพัฒนาชุมชนจังหวัดยะลา, *รายงานคุณภาพชีวิต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งหวัดยะลา ปี 2565* (也拉府社区发展办公室:《也拉府 2022 年人民生活质量报告》), <https://yala.cdd.go.th/wp-content/uploads/sites/47/2022/09/2565.pdf>. 2024 年 8 月 1 日; จังหวัดนราธิวาส, *แผนพัฒนาจังหวัดนราธิวาส พ.ศ. 2561-2564* (陶公府政府:《陶公府 2018-2021 年发展计划》) <https://narathiwat.nso.go.th/images/stitic/t1.pdf>. 2024 年 8 月 1 日。

⑨ World Bank Open Data, *Thailand*,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thailand>. 2024 年 8 月 1 日。

泰铢,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7352 泰铢。^① 也就是说,马来穆斯林的族群边界与低收入阶层边界高度重合。理论上,族群分层容易激发马来穆斯林内部的族群感情和凝聚力,加深其与泰国主流社会的隔阂;同时,主体族群对马来穆斯林“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也会进一步造成马来族抱团,更加降低泰族对其接纳的意愿,最终导致族群边界更为清晰。

然而,族群分层与国族建构危机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机制,此单一视角并不足以解释少数民族群的分离主义倾向。如前所述,生活在泰国东北地区呵叻高原的佬族同样面临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族群分层困境,却逐渐接受了国家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认同建构,即便受到泰国中部主流人群的歧视和排挤,产生的也是地域和阶级属性为主导的政治动员,并未带来当地的族群冲突和国族建构危机。与之相反,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曼谷的华族和泰族在职业阶层分布中比例相差并不大——华族最高级 2.7%、中上级 46.5%、中下级 27.5%、最低级 23.3%;泰族最高级 6.2%、中上级 51.3%、中下级 12.9%、最低级 29.6%^②——在此情形下,当时的华族社会融入却并不成功,与泰国政府的关系也相对紧张。

其次,许多学者也用泰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群的强制同化政策解释马来穆斯林的整合困境,认为类似政策导致了马来穆斯林的政治怨恨,以致泰南问题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武装分离运动。尤其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行宽容同化政策后,马来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有所缓和的情况也增加了这一理论的可信度。^③ 彼时泰国政府开始承认马来穆斯林文化,并特别建立了南部边境地区行政中心(Southern Border Provinces Administrative Centre,简称 SBPAC)作为泰南穆斯林诸府中的最高行政机关,为马来穆斯林和泰国官员提供交流的平台。在此情景下,部分马来穆斯林民众开始区分文化上的族群(马来族)与政治上的民族(泰民族),并逐渐形成一种二元的复合认同。^④

然而,这种视角的解释力仍然不足:一方面我们能看到,泰国的强制同化政策在大部分的其他少数民族群被整合融入泰民族的过程中基本达成了目标;另一方面,泰国政府对待马来穆斯林的宽容同化政策也未能带来实质改变。2001 年,在穆斯林聚居的 44 个县的行政长官中,只有 7 人是穆斯林;副级长官 318 人中也只有 77 人是穆斯林,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⑤ 与此同时,在泰南地区出现了族裔色彩鲜明的马来穆斯林政治派系“瓦达”(Wadah Faction),并陆续发展出了祖国党(the Matubhum Party)、国家党(the Prachachat Party)等区域性的族裔民族主义政党,为政治分离主义的再次崛起埋下了种子。

在政治和经济视角之外,族群和宗教身份认同的因素也经常被学者提及。如亨廷顿就认为在伊斯兰世界中,忠诚和义务都是对于信仰而言的,民族国家并不重要;^⑥ 不少学者指出由于马来穆斯林宗教、语言和文化与泰国主体人群差异较大,很容易产生族群认同与区隔。^⑦ 有学者认为恰恰是因为泰南的马来穆斯林具有一种“种族意识”,导致国家认同被削弱,对泰民族的认同难以建立;^⑧ 在此情形下,即使泰国政府已经在官方称谓中把“马来穆斯林”改称为“泰穆斯林”,马来穆斯林却并不跟随,依然固执地自称为马来穆斯林。也有学者认为是伊斯兰信仰使得马来穆斯林倾向于保守自闭,相比泰国,他们对外

① สำนักงานสถิติแห่งชาติ, รายได้เฉลี่ยต่อเดือนต่อครัวเรือน รายจังหวัด พ.ศ. 2547-2564 (泰国国家统计局:《2004-2021 年各省和地区家庭平均月收入》),<http://statbbi.nso.go.th/staticreport/page/sector/th/08.aspx>. 2024 年 8 月 1 日。

② 施坚雅:《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许华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06 页。

③ 阳举伟、何平:《论泰国政治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政策——以“后銮披汶时代”为中心的考察》,《世界民族》2018 年第 4 期;James Ockey, Michael J. Montesano & Jory Patrick,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Lower South of Thailand, Thai South and Malay North*, 2008, pp. 124-154; 靳晓哲:《冲突与治理:当代东南亚分离运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62-272 页。

④ 周慧芝:《从认同角度分析 20 世纪末泰南问题进入高潮的原因》,清华大学 2012 届博士学位论文,第 45 页。

⑤ Ornanong Noi Wong, *Political Integration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Thai Government toward the Malay-Muslims of Southernmost Thailand (1973-2000)*, Illinoi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01, p. 156.

⑥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 页。

⑦ อัสรี มาหะมะ, *มลายูมุสลิมกับการบวนการทำให้เป็นไทย*, วารสารสังคมศาสตร์, Vol. 29, 2560, No. 1, pp. 127-159 (阿萨里·玛哈马:《马来穆斯林和泰国化进程》,《社会学刊》2017 年第 1 期,第 127-159 页); มุฮัมหมัด อิลยาส หล้าปริง, *พุทธ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รัฐและพุทธ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ชาวมลายูมุสลิม: กรณีศึกษาบทสนทนาเกี่ยวกับแนวคิดเรื่องพุทธวัฒนธรรมในสามจังหวัดชายแดนภาคใต้*, วารสารอิสลามศึกษา, 2022, ปีที่ 13 ฉบับที่ 1, หน้า 228-253 (穆罕默德·亚邦:《国家多元文化主义与马来穆斯林的多元文化主义:以泰国南部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对话为例》,《伊斯兰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228-253 页)。

⑧ Uthai Dulyakasem, *The Emergence and Escalation of Ethnic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the Muslim Malays in Southern Siam*, Singapore: ISEAS, 1986, pp. 48-69.

部伊斯兰世界的亲近感和关注度更高。^① 也有学者提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马来穆斯林的宗教、族群的身份认同已然混淆并杂糅在一起,加剧了形成泰民族认同的难度。^②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从“马来穆斯林性”(Malay-Musliminess)与泰国的主体人群不兼容的视角而言,却忽略了马来穆斯林所处的历史现实情境。马来穆斯林并非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移民来到泰国。按照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理论,泰南三府的马来穆斯林应是典型的“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他们是一种在组织上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完整性、占有一定的领土或故土、享有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跨世代的共同体”,不过原先自治的、领土集中的文化,被并入了更大的社会,但他们仍然希望作为不同的社会与多数群体的文化并列,并且要求各种形式的自治。^③ 按照金里卡的理论,泰国政府不仅并未在政治权力、经济资源等方面给予马来穆斯林补偿,反而一再拒绝其关于政治自治的诉求,这成为国家与少数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且,根据金里卡的理论,华族和佬族都与马来穆斯林不同,前两者都应该被视作“少数族群”,即离开自己的民族共同体而进入另一个社会的个人和家庭移民,他们联合为一种松散的共同体,所寻求的主要是所在社会的接受(并保有一定文化权利),而并不必然要求自治的政治权利。这种差别也是解释马来穆斯林遭遇独特整合困境的原因之一。

此外,也有学者从冷战的地缘政治格局、^④国际恐怖主义运动的发展、^⑤伊斯兰教近年来的回归与复兴^⑥等视角解释泰南马来穆斯林的整合难题。本文同样认为在传统的经济和政治视角之外,身份认同是重要的理解此问题的视角,但相比对马来穆斯林文化的剖析,理解“泰国性”的定义与发展至少同样重要;此外,将民族国家内部政治与国际影响相联的邻域效应视角也应该被放置于更高的位置,才能更有效地解释马来穆斯林在泰国的族群整合困境。

三、“泰国性”与马来穆斯林的认同冲突

当历史进入20世纪,在整个东亚、东南亚与西方殖民者斗争的过程中,民族与民族主义思潮也席卷而来。虽然并未遭遇殖民,但面对新的世界观与岌岌可危的地缘政治形势,泰国政治精英也感到必须将传统的“暹罗王国”变成新式的“泰民族国家”,将散落各地的拥有不同语言、宗教和文化的人群纳入统一的“泰民族”,凝聚人心以维护国家独立自主。这也意味着,必须致力于建构起一种民众普遍接受的、与民族国家相连的“泰”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并能够在此之下协调其内部各族群之间的关系。

首要的任务在于定义何为“泰国性”。泰裔美籍历史学家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指出,尽管泰国性“被假定为所有泰国人都知道的存在”,但没有人能清楚地阐释其内涵。^⑦ 因此,我们需要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官方表述中予以理解。在拉玛五世统治的末期,丹隆亲王(Prince Damrong)把泰国人的民族性格定义为“致力于民族自由,不尚暴力,善于平衡各种利益”,基于这些特质,不同种族的人都能够通过向国王效忠、接受泰语而成为“暹罗人”。^⑧ 1910年拉玛六世即位后,创造出“民族、宗教、国王”三位一体的立国原则。^⑨ 忠于国王、信仰佛教成为定义泰国性的重要指标。20世纪四五十年

① Peter Gowing, Moro and Khaek: *The Position of Muslim Minoritie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Singapore: ISEAS, 1985, pp. 27-40; 傅增有:《泰国南部“4·28”事件的成因及其影响》,《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Patrick Jory, *From Melayu Patani to Thai Muslim: The Spectre of Ethnic Identity in Southern Thailand*,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 15, 2007, No. 2, pp. 255-279.

③ 威尔·金里卡:《多元文化公民权——一种有关少数族群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杨立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95-101页。

④ John L. Linantud, *Pressure and Protection: Cold War Geopolitics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 Korea, South Vietnam,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Geopolitics, Vol. 13, 2008, No. 4, pp. 635-656.

⑤ 卢光盛、李江南:《泰国南部恐怖主义发展的新态势:表现、原因及趋势》,《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9年第3期。

⑥ 贺圣达:《东南亚伊斯兰教与当代政治》,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1-60页。

⑦ 通猜·威尼差恭:《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袁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⑧ 克里斯·贝克、帕素·蓬派吉:《泰国史(第三版)》,李雨晴、金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84页。

⑨ Walter Francis Vella, *Chaiyo! King Vajiravud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ai Nationalism*,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p. 34.

代时,銮·披汶颂堪(Luang Phibunsongkhram)^①对泰国国家的想象则是“在整个国界范围之内,一个由说泰语的、忠诚、追求发展的佛教徒农民组成的同质化的国家”。^② 相比拉玛六世以维护君主制为核心的思路,披汶颂堪对泰国性的理解更具种族色彩,强调泰族的种族优越性。^③ 2014年,陆军司令巴育·占奥查(Prayut Chan-ocha)政变上台之后发布了12条核心价值观,将泰国性与保皇主义、等级制度、牺牲精神和热心公益奉献等愿景联系起来。^④

实际上,尽管表述略有差异,但整体而言政治精英对泰国性的定义均以泰族为核心,并将忠于国王、信仰佛教和使用泰语作为其核心特质。历史学家马蒂·尼尔森(Marte Nilsen)据此将泰国性的内涵总结为“对国家、宗教和君主制三大支柱的忠诚”,并认为其植根于“上座部佛教伦理的道德美德和泰国传统”。^⑤ 尽管近三十年间出现了对泰国性的多元性呼吁,^⑥但仍未能改变上述内涵的主流话语地位。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这种以泰族的单一文化体系为基准的“泰国性”为掌握政权和主导权的泰族精英所设定,泰语语言、佛教信仰和对国王的忠诚被视作区分泰民族和他者的边界,且泰国官方为其赋予了不容置喙的强硬态度。正如泰国学者赛春·素达雅努叻(Saichol Sattayanurak)所称,泰国性是与泰民族同时诞生的概念,是由政治精英创造的官方叙事,后来成为维持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等级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基础。^⑦ 也就是说,尽管泰国性是一种话语建构,但无论各种解释在内涵上如何不同,各派都必须宣称他们通过遵守泰国性而获取合法性,这是泰国政治思想中没有人敢违背的范式。^⑧

显而易见,泰国性对于语言、宗教和政体的强制性要求与大多数泰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并不兼容。威尼差恭指出,“在族类、宗教或意识形态上,他们位于泰国性的边缘地带,而且没有被很好地接纳进泰国性的范围之内”;^⑨这也体现出“在泰国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语境中,泰国性常常宣示着一种官方或支配性话语在对从属或边缘话语施加其特殊秩序时的合法性”。^⑩ 如此秩序下产生的“泰国性”事实上暗含强烈的等级性和排他性,从而也为马来穆斯林与泰民族的身份认同冲突留下了隐患。

在语言方面,泰国境内的马来穆斯林日常使用名为“亚威(Jawi)”^⑪的马来语方言,以阿拉伯字母书写。^⑫ 在语言学上,作为马来语方言的亚威语属于南岛语系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族,与分属汉藏语系壮傣语支的泰语差别很大,反而是与马来西亚境内的吉兰丹州方言较为接近。在传统的宗教学校中,马来穆斯林使用亚威语学习宗教经文,亚威语因此和伊斯兰教形成了紧密的捆绑关系,成为马来穆斯林身份

① 或称銮披汶,军校出身,曾作为民党(Khana Ratsadon)创始成员参加1932年革命,1934年担任陆军司令和国防部长。于1939年和1949年两度将国名由暹罗(Siam)改为泰国(Thailand)。

② 克里斯·贝克、帕素·蓬派吉:《泰国史(第三版)》,第201页。

③ Walwipha Burusratanaphand, *Chinese Identity in Thailand*,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23, 1995, No. 1, pp. 43-56.

④ Nicholas Farrelly, *Being Thai: A Narrow Identity in a Wide World*,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16, No. 2016, pp. 331-344.

⑤ Marte Nilsen, *Negotiating Thainess: Religiou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ailand's Southern Conflict*, Lund University, 2012, p. 48.

⑥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公共领域的建设完善,泰国社会中出现了自下而上解构泰国性的思潮。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强调南部和东北部等很晚才被纳入中央政府统治版图的地方传统,以及泰国境内人群来源的多样性;人们也开始将泰国性用作商品推广,不仅泰国旅游局将其用于打造泰国形象以吸引外国游客,可口可乐、力士香皂等品牌在进行推广时也会强调其泰国特色以至于部分消费者误认为它们是泰国本土商品。参见Craig Reynolds, *Thai Identity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in Craig Reynolds (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Its Defenders: Thailand Today*,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2, p. 31.

⑦ สายชล สัตยานุรักษ์, *ความ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ในการสร้าง "ชาติไทย" และ "ความเป็นไทย"* โดยหลวงวิจิตรวาทการ,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มติชน, 2545: ๑๑๕-๑๑๙ (赛春·素达雅努叻:《銮威集塔干创造“泰民族”与“泰国性”的内涵变迁》,曼谷:民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149页); Saichol Sattayanurak,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Thought on "Thainess" and the "Truth" Constructed by "Thainess"*, Chiang Mai University, 2005, pp. 4-38; Saichol Sattayanurak, *Thai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in Pavin Chachavalpongpun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Thailand*, London: Routledge, 2019, pp. 241-252.

⑧ 通猜·威尼差恭:《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第16页。

⑨ 同上,第212页。

⑩ 同上,第12页。

⑪ 亚威语(Jawi),当地马来穆斯林称之为Bahasa Tempatan,意为“本地语言”。

⑫ Joseph Chinyong Liow, *Islam, Education, and Reform in Southern Thailand: 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p. 17.

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但当北大年苏丹王国被并入泰国领土之后,亚威语在马来穆斯林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泰国一直以来实行单一语言政策,仅承认泰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銮·披汶颂堪上台之后,在1939-1942年间陆续出台了12个用以规范国民行为的文化训令“叻塔尼永”(Ratthaniyom),其中第9号训令规定“正确使用泰语是公民的义务”。^②1947年,马来穆斯林领袖之一哈吉·素隆(Haji Sulong)向泰国政府提交希望实现泰南地区自治的“七点要求”,其中包括“将马来语和泰语一起设为国语”,但遭到了披汶颂堪的拒绝。马来穆斯林中的传统教育机构是私立的伊斯兰教宗教学校“波诺”(pondok),以马来语作为教学语言,主要教学科目是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宗教课程。1964年,泰国政府规定所有注册的波诺必须停止使用马来语教学,并且不再接受新的波诺注册。^③1978年,泰国政府发布了新的语言政策五项原则,清晰地指出“泰语教学应带有强制性并及早推行”,“一切层次上都应把泰语教学看作是通向全民族一体化的途径”。^④

作为唯一官方语言,泰语在各个领域建立了绝对权威,很多机会只有在公民掌握了泰语之后才能获得。使用马来语教学的伊斯兰私立学校最高提供至中学教育,而后续的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均不再提供马来语教学。目前,泰国没有任何使用马来语的高等教育机构,唯有成立于1998年的法塔尼大学^⑤提供与伊斯兰教相匹配的课程与活动,但这所大学的主要教学语言也是泰语。^⑥也就是说,尽管泰国政府并未禁止马来穆斯林继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亚威语,但由于特定的教育和经济机会,甚至政治权利都与泰语牢牢绑定,马来穆斯林必须额外习得泰语方能获得普通泰族人在教育、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权利。诚然,官方语言与族群边缘化之关系可能更为复杂,例如通晓马来语的印度裔和华裔仍然在马来西亚被边缘化,但不适当的语言政策引发族群冲突,乃至国族建构危机的案例也相当常见。语言霸权和统治语言的“纯净”常常是权力斗争、国家和族群认同的焦点问题;^⑦国家如果制订歧视性的语言政策刻意压制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和使用场景,后者文化自尊受挫后很可能产生对政治文化敌意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常常会从最敏感的语言问题展开。^⑧

在宗教信仰方面,马来穆斯林与“泰国性”也存在较大冲突。早在1457年,北大年王国就已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及其教义在几百年间深刻影响了该地区的政治结构、法律法规、教育方式和公共生活,早已成为马来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底色与指导原则,也使得马来穆斯林的族群身份和宗教身份高度重合。另一方面,佛教在泰国虽无国教之名,却有国教之实。早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便已派人前往中南半岛传教。13世纪素可泰王朝建立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佛教的影响力迅速遍及全境。通常认为,目前泰国信仰佛教的人口高达93.58%,^⑨也就是说,在马来穆斯林之外,几乎所有的泰国国民都信仰佛教,泰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有着深深的佛教烙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泰国特殊的历史与国情使得佛教被赋予了比其他宗教更高的政治地位。在泰

① Munirah Yamirudeng, *What It Means to Be Malay Muslims: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Ethn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Ethnic Maintenance of Thai-Malay Muslims*,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Vol. 13, 2017, No. 1, pp. 37-68.

② รัฐนิยม, *ภาษาและหนังสือไทยกับหน้าที่พลเมืองดี*, 2483(文化训令:《关于泰国语言文字以及优秀公民的责任》,1940年6月24日)。

③ 龚浩群:《国家与民族整合的困境:20世纪以来泰国南部马来穆斯林社会的裂变》,《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3期。

④ 洪力翔、冬瑛:《东南亚五国的教育语言政策》,《民族译丛》1994年第1期。

⑤ Fatoni University, 旧称“也拉伊斯兰学院”。

⑥ Anusorn Unno, “We Love Mr King”: *Malay Muslims of Southern Thailand in the Wake of the Unrest*, Singapore: ISEAS-Yusuf Ishak Institute, 2018, pp. 76-77.

⑦ George Simpson & Milton Yinger,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An Analysis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fifth edit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5, p. 401.

⑧ 菅志翔、马戎:《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语言政策》,《学术月刊》2022年第9期。

⑨ สำนักงานสถิติแห่งชาติ, *ตารางที่ 4 ประชากร จำแนกตามศาสนา เพศ และเขต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 (หัวราชอาณาจักร)* (泰国国家统计局:《表4-按宗教、性别和地区划分的人口数据(全国)》), https://www.nso.go.th/nsoweb/main/summano/aE?set_lang=th, 2024年8月1日。

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佛教在从古代暹罗过渡为现代泰王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不仅为泰国民族国家认同提供了集体认同基础,还为泰国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提供了合法性的来源。由于世俗化程度有限,佛教始终与主流叙事深度捆绑,佛教霸权也在泰国社会中若隐若现。披汶颂堪便将佛教视为泰族同一文化的基准,认为“国家与佛教不可分离。宗教是民族文化和道德的柱石,确保了国家的长期繁荣与稳定”;而马来穆斯林甚至一度被要求改宗佛教,以成为真正的“爱国者”。^①

1941年时,披汶颂堪政府曾宣布将以泰国通行法律取代伊斯兰教法对马来穆斯林的婚姻和继承问题进行裁决。^②这引发了马来穆斯林的极大不满,曾担任北大年府府尹的帕亚·拉塔纳帕迪(Phraya Rattanaphakdi)表示,“马来穆斯林觉得自己受到了压迫,因为他们不被允许使用马来语和信仰伊斯兰教。他们被迫使用泰国名字、说泰语并遵循泰国传统。(在马来穆斯林眼中)泰国政府的政策旨在将泰国的马来穆斯林转变为泰国佛教徒”。^③

1948年披汶颂堪二次执政后,为缓和双方矛盾,泰国政府也对此做出了调整,比如在南部三府和宋卡府府中根据伊斯兰教习惯将星期五视作假日;在婚姻和继承方面继续遵守伊斯兰教法;在政府办公室中可以穿着穆斯林服饰等。^④但上述调整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宗教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佛教仍然在泰国性中处于核心地位。作为泰国立国三原则的“民族、宗教、国王”的“宗教”专指佛教,直到《1997年宪法》才对“宗教”一词的定义进行了修正,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终于被囊括进来。^⑤但佛教的“事实国教”地位并没有被撼动,国王与总理必须是佛教徒,这一直是泰国的政治惯例,甚至通行的纪年方式也是佛历纪年。^⑥

宗教和政权的深度捆绑随之带来了政治忠诚的难题。对于泰国来说,王权是泰国政治权威中的核心。泰国历史上一直是君主专制国家,由于未经受殖民,王室的威望并未如缅甸等国一样被殖民者摧毁,因而有关王室神圣形象的主流叙事仍深植民众心中。尽管在1932年革命后,政治制度由君主专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后一度衰落,但整体而言,王权始终是泰国政治权力的核心。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拉玛九世与军人团体达成合作之后,民众对于国王的政治效忠日渐与对政府的政治认同合而为一,成为凝聚泰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由于泰国始终未能真正实现世俗化,国王除了作为政治领袖,还具有浓厚的宗教领袖的色彩。数百年来,泰国国王与佛教之间已经建立了不可分割的紧密关联。王权与佛教互利互惠,国王自称是佛陀在人间的代理人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佛教也借此抬高自身地位。然而,对于马来穆斯林而言,当国家要求其成为沐浴王室恩泽的泰国公民,而最高政治权威泰国国王是佛陀的化身,则意味着马来穆斯林需要对作为领袖的佛陀表示效忠,这无疑为马来穆斯林带来巨大的不适感。

综上所述,泰国精英在定义泰国性时,将其内涵设计得相对狭隘,且边界又过于僵硬,它不但无法兼容在语言、宗教和政治权威方面异质性较高的马来穆斯林,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双方在文化身份上的不平等,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在如此“泰国性”的定义中,泰族精英将马来穆斯林视作外族,马来穆斯林也难以将自己视作泰民族的成员。当国家基于泰国性推出强硬同化政策,政治怨恨就难免在身份认同的裂痕中滋长,为马来穆斯林与国家的对峙和冲突埋下了伏笔。

① 周方治:《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② ปิยนาค บุญภาค, นโยบาย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ไทยต่อชาวไทยมุสลิม ในจังหวัดชายแดนภาคใต้ (พ.ศ. 2475-2516), กรุงเทพฯ: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2546 (披亚纳·汶纳:《面向南部边境地区泰穆斯林的官方政策(1932—1973年)》,曼谷:朱拉隆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③ Takashi Tsukamoto, *Escalation of Ethno-Cultural Tensions in Southern Thailand in the Midst of Assimilation and Homogenisation*, in Chosein Yamahat, Sueo Sudo & Takashi Matsugi (eds.), *Rights and Security in India, Myanmar, and Thailand*.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2020, p. 71.

④ Ibid., pp. 79-80.

⑤ Charles Keyes, *Theravada Buddhism and Buddhist Nationalism: Sri Lanka, Myanmar, Cambodia, and Thailand*, *The Review of Faith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4, 2016, No. 4, p. 47.

⑥ 宋清润、张锡镇:《当代泰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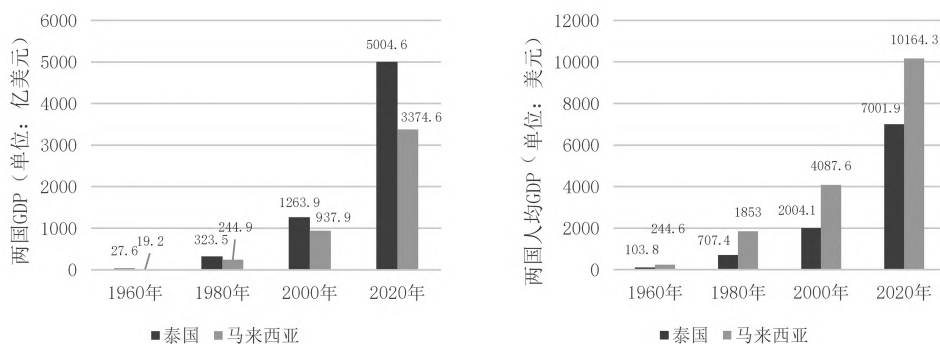
四、邻域效应与泰国国族建构难题

在近年来的国族建构和族群政治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试图将国内冲突与国际因素相联系,尤其是针对跨境族群议题,学者们提出邻域国家和跨境族群可能带来的难民聚集、^①武装冲突越境、^②干涉内政和庇护同族^③等方面的影响。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特别指出,外部族群连结及其为该族群提供的支持,可以改变一国之内的国族政治动态;当外部连结的族群提供对跨境族群的支持与保护时,该少数民族就能获得额外的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本,用以对抗民族国家内部加诸自身的国族建构。^④甚至,一国在国族建构上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国界之外的影响因素,即邻域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对跨境族群而言,能否抵抗居住国的国族建构计划,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较强大的外部同族国家。^⑤韩恩泽进一步指出,考虑邻域效应时必须纳入邻国之间的国力比较与整体邻国关系因素,因为二者都有可能显著影响一国的国族建构进程:整体而言,国力较强的国家更有可能干涉邻国在边境地区的国族建构进程;在国力相当的情况下,若两国彼此关系呈敌对状态,则有可能在边境地区出现武装对抗和军事化,若两国关系相对友好,则邻域效应会相对弱化。

在讨论泰国境内的马来穆斯林整合困境时,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马来穆斯林作为跨境族群的特殊身份,以及其外部同族所在国马来西亚^⑥在其中的角色。历史上,泰南三府的马来穆斯林本与马来西亚境内的吉达(Kedah)、吉兰丹(Kelantan)、玻璃(Perlis)和登嘉楼(Terengganu)州同属北大年苏丹王国,经1909年《英暹条约》才被人为划分在国界线两侧。国界两侧的马来人世居于此,宗教信仰一致,使用的语言相同,具有天然的亲缘纽带。

从泰国与马来西亚两国的国力比较而言,二者相对平衡,谁也无法从政治经济上压倒对方。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国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回顾1960年以来两国的情况可以发现,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泰国高于马来西亚,但在人均GDP上马来西亚又更占优势(见图1)。两国在贫困人口比例、军事开支、成人识字率、婴儿死亡率等发展指标上的表现也相差无几(见表1)。因此,边境地区的泰南马来穆斯林整合困境,必须回归两国关系的历史语境中去寻求答案。

图1 泰国、马来西亚的GDP与人均GDP(以现价美元计算)^⑦



① Myron Weiner, *Bad Neighbors, Bad Neighborhoods: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Refugee Flow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1996, No. 1, p. 26.

② Suda Perera, *Alternative Agency: Rwandan Refugee Warriors in Exclusionary States*, Conflict, Security & Development, Vol. 13, 2013, No. 5, pp. 569-588.

③ Melissa M. Le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Incomplete Sovereignty: How Hostile Neighbors Weaken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2, 2018, No. 2, pp. 283-315.

④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5.

⑤ 韩恩泽:《强邻在侧:中泰边区博弈下缅甸的国家命运》,林纹沛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1页。
⑥ 英国殖民期间称该地为英属马来亚。1957年宣告成立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后于1963年与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重组为马来西亚(Malaysia)。为保持行文的一致性,本文统一用马来西亚称呼各阶段政权。

⑦ 数据来源:World Bank Open Data, *Thailand*,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thailand>; World Bank Open Data, *Malaysia*,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malaysia>. 2024年8月4日。

表 1 泰国、马来西亚在特定项目的发展指标数据^①

	泰国	马来西亚
人口数量(万人)	7180.1279(2023 年)	3430.8525(2023 年)
以国家贫困线衡量的贫困人口比例(%)	6.2(2021 年)	6.3(2021 年)
军事开支(占 GDP 的百分比)	1.2(2022 年)	1.0(2022 年)
成人识字率(%)	94(2022 年)	95.72(2021 年)
婴儿死亡率(%)	0.8(2022 年)	0.8(2022 年)

早在 1957 年马来亚联合邦成立时,“马来人至上”主义(Ketuanan Melayu)就是其建国的核心准则之一,1969 年通过的《马来西亚联邦宪法》正式确认了马来人在马来西亚的特殊地位,享有相较于华族和印度族而言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例如宪法在公共服务职位、奖学金、助学金及其他教育训练特权或特别设施方面为马来人保留其认为合理的比例份额,企业在办理营业许可证或执照时,也需将一定的份额保留给马来人。^②在此情形下,马来西亚作为主权国家为马来族带来的权利不仅为泰国境内的马来穆斯林提供了要求自治,乃至独立的理论来源,更提供了一种“自治/独立就能改变自身境遇”的期待与想象。虽然较整体国力而言泰国与马来西亚之间较为接近,但若以微观视角观察,便会发现国境线两端的马来穆斯林在实际生活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2022 年,马来西亚的吉打、吉兰丹、玻璃和登嘉楼四州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 5902、3765、5256、7318 美元;^③同年,北大年、也拉和陶公府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仅为 2471、2963 和 1842 美元。^④从马来穆斯林的视角来看,经济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自然会加大其心理落差,增添几分对马来西亚的向往之情。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也的确对泰国的马来穆斯林予以政治支持。活跃于马来西亚北部的反对党马来西亚伊斯兰党(Malaysian Islamic Party,简称 PAS)成立于 1951 年,该党是奉行马来民族主义的宗教政党,其主要支持者来自马来西亚北部的吉兰丹、登嘉楼等州,成员多为原教旨主义穆斯林。PAS 经常公开表达他们对泰国马来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希望他们能够获得独立或者并入马来西亚领土。^⑤需要说明的是,PAS 虽然未能进入中央政府,但其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时就在北部各州赢得选举;由于马来西亚实行联邦制,因此该党不但在当地占据政治主导,也在全国政治舞台上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在 1959 年大选中,PAS 在吉兰丹等北部州大获全胜,巫统^⑥为了争取选票,开始与 PAS 争相表达对泰国马来穆斯林的关切。马来西亚的双重国籍政策正是在这个时段出台,对泰国的马来穆斯林提供了巨大的鼓舞。^⑦1961 年,在 PAS 的推动下,马来西亚通过一项鼓励泰南穆斯林迁居马来西亚的议案,该项政策为后来历届马来西亚政府所继承,成千上万的泰南马来穆斯林据此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吉兰丹等州。20 世纪 70 年代,PAS 党主席穆罕默德·阿萨里(Mohd Asri bin Muda)担任马来西亚国土部长时,在马来西亚靠近泰国边境的地区建立了土地分配社区,允许泰国的马来穆斯林前往定居,且定居三年后可获得马来西亚国籍。^⑧许多生活在吉兰丹和陶公府之间的马来穆斯林拥有双重国籍,对他们来说,马来西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泰国之外的选择。对于普通的马来穆斯林民众来说,它既可以是一个工作地点,也可以

① 括号内数字为可获得最新资料的年份。数据来源:World Bank Open Data, *Thailand*,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thailand>; World Bank Open Data, *Malaysia*,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malaysia>; Global Data. *Literacy Rate in Malaysia* (2010–2021, %), <https://www.globaldata.com/data-insights/macro-economic/literacy-rate-in-malaysia/>. 2024 年 8 月 4 日。

②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Article 153, 1969.

③ Wikipedia, *List of Malaysian States by GDP*,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List_of_Malaysian_states_by_GDP&oldid=1236147701. 2024 年 8 月 4 日。

④ วารีกิพีเดีย, รายชื่อจังหวัด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เรียงตามผลิตภัณฑ์มวลรวมภายในจังหวัดต่อหัว(维基百科:《泰国各府根据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的排序》), <https://th.wikipedia.org/wiki/รายชื่อจังหวัด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เรียงตามผลิตภัณฑ์มวลรวมภายในจังหวัดต่อหัว>. 2024 年 8 月 4 日。

⑤ Wan Abdul Kadir Che Man, *Muslim Separatism: the Moros in Southern Philippines and the Malays in Southern Thailand*,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7, p. 231.

⑥ 巫统,即马来民族统一机构(the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 UMNO)。

⑦ John Funston, *Malaysia and Thailand's Southern Conflict: Reconciling Security and Ethnic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2, 2010, No. 2, p. 239.

⑧ 陆继鹏:《国际因素与泰南四府民族分离问题》,《世界民族》2007 年第 4 期。

带来额外收入;对于分离主义者而言,马来西亚更是一个潜在的避难场所,让他们的斗争有了退路。^①显而易见,马来西亚作为外部同族国对马来穆斯林的欢迎也会动摇他们对泰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相较而言,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态度较为克制,至少在官方表态中,马来西亚一直对泰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表示尊重,泰马两国中央政府也一直保持了较为友好的双边关系。1955年马来西亚最大政党巫统主席东姑阿卜杜勒·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在访问曼谷时表示,为回报泰国人对马来西亚独立斗争的支持,马来西亚不会对泰南马来穆斯林的反抗运动提供援助。^②但事实上,马来西亚在对待泰国境内马来穆斯林问题上的态度一直较为暧昧,并随着国内政治形式不断波动。1948年,马来西亚的部分左翼政治组织被宣布为非法,其成员也不得不逃亡泰国南部边境地区避难。泰国政府对这些马来西亚的政治反对派在边境地区的活动视若无睹、姑息纵容,这被视作泰国对马来穆斯林问题的牵制与回击。马来西亚政府也的确暗中与泰南马来穆斯林反抗集团保持联系,以作为钳制泰国的砝码。例如,也拉府巴登县的一名警察曾提到,当泰国警察在边境清剿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PULO)成员时,该组织成员经常逃入马来西亚境内,而马来西亚军队则禁止泰国警察入境追捕。^③

种种迹象均表明,在泰国试图将马来穆斯林纳入泰民族时,马来穆斯林却仍然与国境线另一侧的马来西亚同族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暧昧态度、宗教政党的公开支持以及民众的普遍同情共同巩固了他们对马来族穆斯林身份的留恋与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马来穆斯林不仅很难拥抱与自身大相径庭的泰国性,而且在不断延续的分离主义运动中,他们也很难将作为族群和文化身份的马来穆斯林认同和与追求自治和独立的政治认同区分开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与泰国华族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初期,很多移民至泰国的华族与中国保持了密切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披汶颂堪政府持亲日立场,对泰国的华族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均持打压政策,^④很多政策在冷战初期甚至愈演愈烈。^⑤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明确表示不再承认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该政策是中国政府考虑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地区局势等多重因素后做出的综合决断,希望有利于华侨在当地的发展。此后,泰国修改了国籍法,放宽了入籍限制;并于1956年颁布《公民权法令》,允诺入籍的华人不再受《保留泰人职业法令》^⑥限制,可以享受与泰人同等的公民权利,从事此前只有泰族公民才能从事的职业,其在泰国出生的子女也可以自动获得泰国国籍等。20世纪50年代后期,95%的华侨都加入了泰国国籍。^⑦1980年,中国颁布国籍法,进一步确认实行单一国籍制度。^⑧中国政府对待海外华人政策的变化有效改善了华侨在泰国的处境,加速了其有机融入泰国社会的进程,也对中泰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泰国华族遍及各行各业,早已实现了从外侨经济到族群经济的转变;华语逐渐从母语退居至第二外语,大部分华族子女选择入学公立学校;在进行政治参与时,无论是候选人还是选民都很少以族群身份竞选,泰国政坛中也始终没有出现华族的族群政党。华族已经全面、深入地融入泰国社会,而这与新中国调整后的鼓励归化的政策息息相关。

五、结语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马来穆斯林问题业已成为泰国社会中的沉疴旧疾,它涉及的方面广泛且复杂,很难从单一视角做出完备的解释。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在梳理主流的解释理论后,提出以“泰国性”引发的身份认同冲突和泰国—马来西亚国力对等情形下的邻域效应两种视角予以补充。本文认为,

^① Duncan McCargo, *Tearing Apart the Land: Islam and Legitimacy in Southern Thai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

^② John Funston, *Malay Politics in Malaysia: A Study of the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and Party Islam*, New Hampshi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0, p. 136.

^③ 陆继鹏:《国际因素与泰南四府民族分离问题》,《世界民族》2007年第4期。

^④ Joseph Jiang, *The Chinese in Thailand: Past and Present*,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7, 1966, No. 1, pp. 39-65.

^⑤ 刘雄:《冷战格局下泰国华侨政策的演变(1946-1965)》,《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⑥ 这一法令于1942年、1949年、1952年多次修订,期间具体的职业类型与数量有所调整,但总体原则都是规定部分职业只有泰人可以从事,以及为泰人在企业中保留一定数量的工作岗位。

^⑦ 许梅:《泰国华人政治生活的变迁》,《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2期。

^⑧ 梁英明:《东南亚华人研究——新世纪新视野》,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61-165页。

“泰国性”的定义过于狭窄且僵硬,不但难以包容想要保持自治权利和自身文化独特性的马来穆斯林,其带有的等级色彩更是加剧了政治怨恨与身份认同冲突;另一方面,马来西亚作为与泰南三府接壤的重要邻国,虽然国力整体上与泰国旗鼓相当,但由于其对泰南地区的马来穆斯林维持了一种暧昧且摇摆的政治支持,对该地区造成了负面的邻域效应,也使得泰国的国族建构在该地区难以成功。

泰国境内的马来穆斯林问题目前已经进入了一种难解的困境:极端派的马来穆斯林致力于伊斯兰教复兴,希望从泰国分离实现独立建国;而大多数马来穆斯林民众已经对无休止的恐怖袭击感到疲倦,开始尝试接受马来—泰国人这一复合认同,更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参与泰国政治、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但受到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整体而言大部分马来穆斯林民众仍呈现出被动嵌入局面,想要他们真正接受多元化认同,接纳泰民族身份仍需等待契机。但无论如何,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泰国性”僵硬的准入边界并非处理少数民族整合困境的有效途径,马来西亚的角色也需要引起泰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化解马来穆斯林的整合困境,真正实现有效的国族建构。

在当今世界,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泰国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的紧密友邻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分析其国族建构历程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泰国政治与社会至关重要。2025 年是中泰建交 50 周年,开展相关研究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泰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更能助力我们拓宽视野,把握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动态与趋势。当然,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不止于对当地的历史知识进行发掘、梳理和整合,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以邻为鉴,回应并关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国族建构的重大议题,为国族建构相关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略尽绵薄之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对照泰国国族建构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不但应当持续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更应当庆幸并努力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包容性。唯有如此,当代不同的少数民族才有足够的空间和动力对中华民族抱持深刻的归属感与坚定认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深刻认识到邻域效应的持续影响力,在睦邻友好的语境中进一步明晰“跨境族群”的政治认同边界与义务,既保障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又充分建立起民族国家内部的跨地域、跨文化联结,在团结与发展中抵御和削弱负面的邻域效应。

Identity Conflict and Neighborhood Effect in Nation-Building: The Challenge of Ethnic Integration with the Malay Muslims in Thailand

ZHANG Zhe¹, LIU Yu-di²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ailand's nation-building process, most minority groups eventually accepted the state's integration policies, embracing "Thainess" to varying degrees. However, Malay Muslims have consistently resisted ful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Thai nation. By comparing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other major minority groups in Thailan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ntegration crisis of Malay Muslims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In addition to the widely discussed political grievances arising from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forced assimilation, we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identity conflict triggered by Thailand's narrow definition of "Thainess" and the negative neighborhood effect exerted by Malaysia.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Thai state's overly exclusive and hierarchical definition of Thainess, combined with Malaysia's ambiguous and fluctuating stance toward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of its ethnic kin across the border, has significantly shaped the integration difficulties with Malay Muslims.

Key words: Nation-building; ethnic Integration; Thainess; Malay Muslim

[责任编辑 乌仁图雅 孙 昉]